

編後語

在中國大陸，各界精英對於關涉到中國命運的重大議題缺乏共識，正成為人們擔憂的一個現實。然而，也有少數例外，這就是體制內政治精英和體制外知識精英大多期盼或呼籲「告別革命」；甚至連署名韓寒的三篇博文也在新舊媒體上引起一陣轟動，「韓三篇」的名聲一度大有超越「老三篇」之勢。體制內精英大多本來是革命黨精英的後來人，他們反對革命主要是出於對成為革命對象的恐懼；體制外精英（及其先人）曾幾何時既有革他人之命的革命狂熱份子，也有被他人革命的革命對象，今天大都「告別革命」，主要冀盼中國能通過溫和的、漸進的改良（或改革）而走向一個全新的世界。然而，「應該告別革命」也好，「革命還值得一搞」也好，這些論述都是在應然的層面上展開討論，忽略了實然層面的眾多問題。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選刊的兩篇文章，致力於回答實然性的問題，即當今中國有無可能發生革命，以及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是否有可能演化成大規模的社會動蕩甚至引發社會革命。趙鼎新之文章分析道，革命爆發的前提是現行政權和制度出現合法性危機，而合法性危機會否爆發以及爆發的深度，取決於現有的合法性基礎。當今中國政權對於績效合法性產生了過度的依賴，由此導致了發展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與此同時，政權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式微後再也無力塑造一個能被廣泛認可的主流價值體系，也不願意把合法性的重心轉移到程序合法性層面上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合法性危機的確是達摩克利斯之劍。然而，即便合法性危機日益凸顯，距離革命的爆發尚有一定的距離，中間要經過集體行動的蓬勃和社會運動的動員這兩個階段。即便如此，只要政權統治不建立在以程序—規則合法性為基礎的全新制度架構之上，合法性危機和大規模暴烈性社會革命的爆發，在可見的未來始終是中國和全世界必須要面對的大風險。

合法性危機萌發的一個具體體現就是「群體性事件」的增多。當人們在訴求難以通過制度化的管道得以回應的情形普遍存在之時，訴諸集體行動也就成為不得不為之但卻是必然的選擇。在應星抽絲剝繭的分析下，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有不同的根源、不同的表現形式和不同的組織化程度。這些群體性抗爭從小到大最終走向反叛並引發社會動蕩的可能性並不大，但是從社會潰敗走向社會崩潰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這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在於執政者的「維穩政治學」理念和施政。如果國家在面對既得利益集團的特殊冀望和普羅大眾的公平要求之間進退失據，未能在制度合法性的強化上下一番真功夫，「維穩政治學」有可能演變成「促亂政治學」。

從下一期開始，我刊將展現新的面貌。原有的若干欄目將合併為「學術論文」和「學術綜述」欄目，書評欄目將加強學術的深度，同時我刊將刊發更多直擊現實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評論性文章。